來篇長文。致我不願告別的年代：

撰文\安煥然

三十年前的大學時代，臺灣的歷史系學生幾乎是人手一冊余英時《歷史與思想》。那是當時的「時尚」也是一種信念。尤其作為錢穆先生這一系譜下來的，從我的大學，到學術研究、教學，講歷史的同時，我們有一股難以言喻的「入世」的人文關懷。是一個動力。是信念，也是一種處世的態度。

謹此，以十四年前以余英時同名著作《歷史與思想》為題寫的一篇邊緣評論，敬悼一代知識學人。

文章是寫我大學時代反「反智」的生活。知道今朝或許已是一個時代的結束，但我真的不想告別。讀書人的「入世」精神，人文與民主，我們仍然要傳承和堅持下去。不然我真的是寫不了文章，教不了什麼了。

歷史與思想

安煥然

留台歲月，不能忘記的還有大學裡的學長。

第一次和系裡的學長眾聚一堂，是因為「教官」。那是我們（成大歷史）系裡男同學的一個傳統：每年的新生報到，教官總要跟大家見個面，偏偏我們系裡的教官是條漢子，與新生的「見面禮」竟是請我們喝酒。這實在是一項「預謀」。

「學弟，乾杯！」教官叫來所有的在籍學長輪流向新生敬酒，乾到我們這群菜鳥吐滿地，醉倒為止。學長扶著，歡歌笑語：我們好像在哪裡見過！讀歷史系的是好兄弟，哈哈哈……酒氣與豪氣，瘋言醉語。

那天之後，一些有心的學長時常會到宿舍串門子，閑坐打屁，徹夜長談，談一本書、論一則歷史，談人生、說文化憂思，大學生知識分子的心靈去向。有時他們也會拉你去聽演講，參加讀書會。不論是學問還是氣度，其中兩位最令我們折服的學長是李宜憲和劉康，他們都是當時（1980年代末）成大校園「思想前衛」學生社團「經緯社」的靈魂人物。

劉康學長是系上公認的第一才子。據說他在中學時代就已經把《史記》和《資治通鑑》都「讀完」了。他很少講廢話，也很有傲氣，上課不屑老師的言說可以當場很不客氣地（也要有那個能耐功底）和老師辯論。惟他對學弟妹倒很客氣，常鼓勵我們要多看書。他來我們的宿舍，眼珠子常是盯著我們的書架上添加了哪些書：「啊！學弟，這是一本好書。看了沒？」——汗顏。

他常跟我們談歷史與思想，梁啟超的、蕭公權的、余英時的、五四學人、中國政治思想、西方思潮，尤崇民主政治與自由主義，說起當代中國／臺灣政治，批判尤甚。經緯社常辦小型講座和出版前衛性的校園報紙，劉康都是名嘴和健筆。他曾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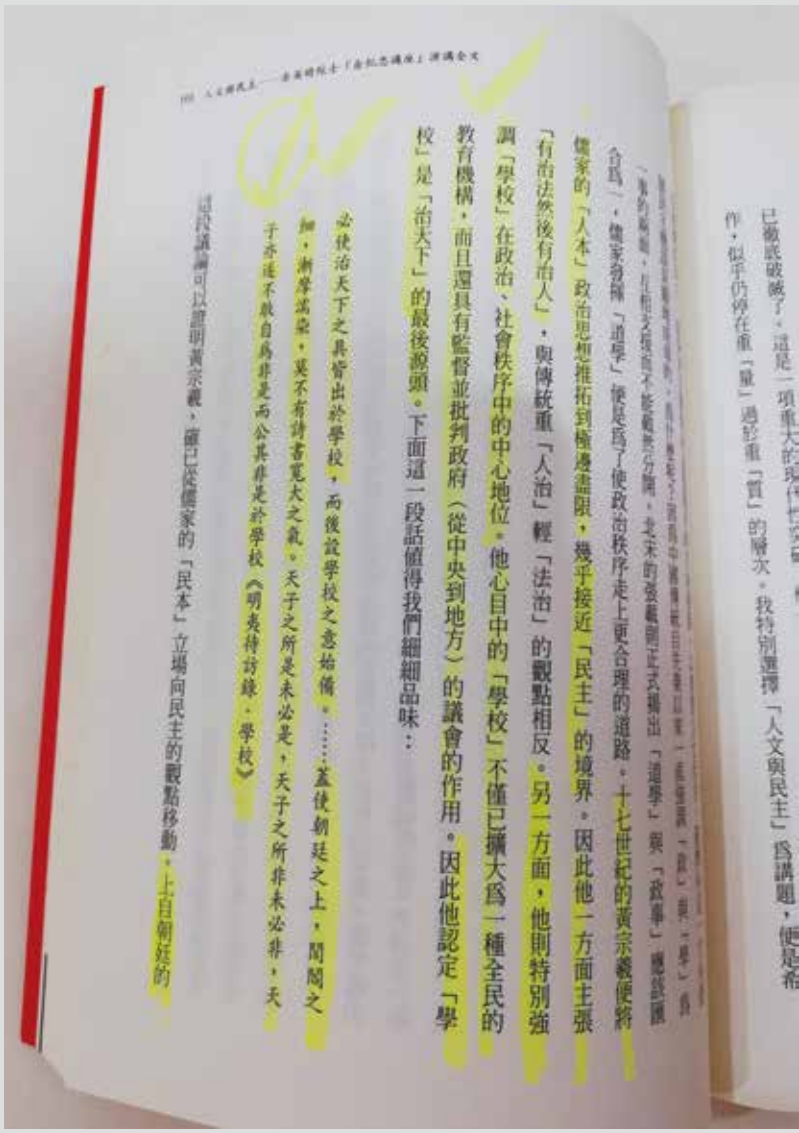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覺得整個近代中國困局的關鍵即在此，問題並不在於中國的思想家們無法回應時代的挑戰，而在於統治者的私心和權力欲。過去一個世紀中，中國雖歷經無數的動亂

與革命，但依然無法建立穩定和平的政治秩序和獨立自主的價值系統，國共兩黨分別以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政治主張，但骨子裡根本就是極權主義，還是從中國封建傳統中產生的怪胎，在他們所宣揚的主義背後，真正的心態是掌握政權，對統治者而言，權力本身就是目的，所謂主義，只是維護權力的工具。」（〈K館的歲月：臨界心情〉《經緯》第14期，1989.11.1）

至於李宜憲學長，為人就風趣多了，有時候在宿舍走廊上聽到臺灣民謠，就知道他來了。學長批判現實也很刁，而且學理兼具。他開創了系上「讀書會」之風，但據說開辦之初受到阻礙，有人勸請他把這讀書「會」改成讀書「小組」，因為當時的認知：「讀書會」這名稱是五四時代共產黨搞的。學長卻怎麼也不肯改。

讀書會不是補習做功課，它重在導讀與交談，有時我們讀的可是「古文」啊！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系上讀書會，宜憲學長導讀黃宗羲《明夷待訪錄》裡的《原君》：

「古者以天下為主，君為客，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，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為主，天下為客，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，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腦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產業，曾不慘然……其既得之也，敲剝天下之骨髓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樂，視為當然。曰：『此我產業之花息也。』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」



說到氣憤處，爽性的就往系學生會所牆邊的一個紙箱上坐。怎知紙箱是空的，整個人跌個四腳朝天，我們都笑了，學長也哈哈大笑。

學長和學弟的日子，歷史與思想的激盪，那的確是一段不怎麼懂得與現實妥協的浪漫歲月。那個時候我們很喜歡看書，而且多是看課外書。經緯社常辦一些小型書展，多是展賣一些奇奇怪怪的書，什麼《單向度的人》、《存在與虛無》，接觸西方馬克思主義，什麼（後／新）馬克思的，也意識到那個什麼是「知識份子的鴉片」。從盧卡奇、沙特、馬爾庫塞、葛蘭西，到哈貝馬斯的溝通倫理學，也在那個時候似懂非懂的「讀」了。

然而，在我們讀歷史系的學生的書架上，穩佔一席之位的還是余英時的著作。這位在2006年剛獲得克魯格得獎的歷史學家，其著作《歷史與思想》幾乎是我們當時歷史系學生都人手一冊的。關於中華文化的傳統與現代，讀余英時的書，可以感受到這位學養具備的學人其「中國情懷」與自由主義的結合。這是當年學長們都極力推薦的學者及其著作。

回首話當年，不無遺憾。陳正國〈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〉（《當代》第232，2006.12）一文亦感慨地說，就在余英時獲得相當於諾貝爾級人文學獎的當下，對臺灣而言，「余英時反而代表一個學術時代的結束。首先，在臺灣，共織『中國情懷、自由主義、傳統與現代的辯證』的追求已經逐漸遠去；如果不是已經飄散於空中。」

而那年我們與學長歡聚喝酒的小吃店：一百碗，如今也不在了。

原載於星洲日報·文化空間·邊緣評論，2007.3.4。2019年修訂，收載於安煥然《邊緣評論·文化漫步》，吉隆坡：三三出版社，2019，頁278—281。